

《鼠疫》:在荒诞与反抗之间

王洪琛

(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广东广州,510275)

摘要:小说《鼠疫》借助对苦难、死亡与存在的思考,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推到极致,构造了人类反抗姿态与荒诞处境之间的张力,肯定了一种力所能及的行动,提示无神时代的现代人在爱中寻找信仰之源。因此,在荒诞与反抗之间实现自我的定位,成了《鼠疫》给予现代人的重要启示。

关键词:加缪;《鼠疫》;荒诞;反抗

中图分类号:II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06)05-0587-05

小说《鼠疫》(1947)是法国作家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历时6年完成的一部力作,描述了在北非一个叫奥兰的小城发生的一场持续近1年的鼠疫之灾。作者生动地刻画了在那个恐怖时期人们所经历的从肉体到精神的折磨,以及对幸福和安宁的渴望。小说取材于真实的生活现实,又注入作家一贯的对生命与死亡的思考,因此,虽然情节简单,但意蕴丰富,常读常新。

早在1940年巴黎被德国法西斯占领时,加缪就打算用寓言的形式对这一吞噬千万人生命的恐怖时代给予回应。当时的法国人民——除了一部分从事抵抗运动者外——就像欧洲中世纪鼠疫流行期间一样,长期过着与外界隔绝的囚禁生活。因此,把在纳粹铁蹄蹂躏下的法国搬到小城奥兰,把残酷的战争转换成肆虐的鼠疫,这部作品的象征意义显而易见。小说结构严谨,生活气息浓郁,人物性格鲜明,贯穿着人与鼠疫搏斗的史诗般的篇章、生离死别的动人哀歌、友谊与爱情的美丽诗篇、地中海海滨奇幻的画面,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在卷首献词中,加缪引用了英国作家笛福的话,“用别样的监禁生活再现某种监禁生活,与用不存在的事表现真事同等合理。”^{[1](63)}显然,这里所谓的“某种监禁生活”,类似于帕斯卡尔关于“在终极意义上,人都是一个被流放的国王”的比喻,指示现代人荒诞的生存处境;同时,《鼠疫》又通过对创造生命价值的反抗姿态的刻画,肯定了一种力所能及的行动与思想,让我们在爱的交融中领会荒诞与反抗之间的张力。这些都使作品

远远超越了现实政治层面,进入存在论维度。本文力图借助对表层文本的叙事学解释与对深层意蕴的哲理性挖掘,从双重维度把握《鼠疫》中细腻丰富的肌理。

《鼠疫》一共有五个部分,讲述一个从发现鼠疫、陷入绝望到寻找对策、摆脱鼠疫的故事。阿尔及利亚的奥兰是故事发生的地点,这是一个没有鸽子、没有树木和花园的现代化都市,市民们每天麻木地消磨着时光。在小说第一部中,鼠疫开始降临这座城市,恐慌的情绪在市民中流转。于是市政府下令紧闭城门,成了“囚徒”的市民在死亡的威胁下,忍受着与亲人分离的痛苦和供应不足带来的困难。第二部着重描写流放感,“那时刻不离我们心田的空虚,那确切切切的激情,那希望时间倒流或相反,希望时间加快飞逝的非理性的愿望,那刺心的记忆之箭,正是这种流放感。”^{[1](104)}随着疫情的发展,绝大部分人认识到应该同鼠疫作斗争,而不应该听之任之,或屈服于恶。塔鲁组织了第一个志愿防疫队。里厄医生日夜不停地救治病人,阻遏疫情的扩散,化解人群中弥漫的恐慌。第三部继续用诗一样的笔触描写“离情和放逐感,以及这些感情所包含的恐惧和愤慨”^{[1](160)},此时“所有人的内心也都像黑夜一般忧郁”^{[1](163)}。“那逐渐充满整个城市的无休无止、令人窒息的沉重脚步声,

收稿日期:2006-05-08;修回日期:2006-06-08

作者简介:王洪琛(1974-),男,河南安阳人,文学博士,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博士后,主要从事文艺美学与批评方法的研究。

它夜复一夜,以最忠实最忧郁的音调呼应着那盲目的执着之情,这种情绪终于在我们心中取代了爱情。”^{[1](170)}在第四部中,希望之光逐渐从黑暗中冉冉升起,里厄与塔鲁的友谊也让我们感受到一丝温暖,但鼠疫依然笼罩全城,一个无辜孩子的死与帕纳鲁神甫布道的失败让人质疑“神正论”的正当性。在最后一部分中,不懈的反抗有了成效,肆虐的鼠疫终于奇迹一般消失,奥兰城在欢呼声中解禁,但里厄医生并没有感觉到多少轻松。——这就是作家的叙事轨迹。

这部小说最明显的主题是隐喻了欧洲在抵抗纳粹时的选择:它通过“荒诞”与“反抗”之间的辩证转换,体现了从“个人反抗”到“集体反抗”的意识演变。鼠疫的残酷已经不仅仅属于个人,而是所有人的命运,是我们共同的历史,“原本属于个人的感情,比如,和心爱之人的离情别绪,从最初几周开始,都突然变成了全城居民的共同感情,而且还夹带着担惊受怕。”^{[1](102)}因此,加缪关于“作品是一种经常意在言外的哲学终点,是这种哲学的图解和完成”^{[2](126)}的创作主张在这里得到了恰切的实现。值得注意的是,在给罗兰·巴特的公开信中,加缪又明确表示,“我希望人们从几种意义上来阅读《鼠疫》”^{[3](148)},也就是说,在创作时他已赋予了小说多重的解读空间,从而使这部现代小说显示出了叙事模式的独特性。

众所周知,多样性和不确定性是现代小说的共同特点,它源于现代人观念中对传统世界观和小说本体论的转变。在《鼠疫》中,叙事时间与事件空间的穿插和搏斗,不仅打破了传统小说以某一个叙述者为主的话语霸权,而且营造了一个充满寓意的舞台背景,使小说的故事情节转化成了一种情势和氛围,众多人物在此“自由选择”,“诉诸行动”,演绎人类的生存荒诞性。比如,在小说末尾,作者承认里厄医生是故事的叙述者,而且里厄沉着冷静的救治活动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作者并没有让他的活动覆盖整个舞台;面对灾难,朗贝尔内心发生的转变更让我们感到人性的真实与丰富,领会到“圆形人物”的魅力。由此,《鼠疫》体现了一种泛狂欢化的风格,突破了从塞万提斯到托尔斯泰习惯性维持着的均衡的叙述节奏。这里显然可以看出加缪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卡夫卡的继承。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巴赫金强调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实现了对独白型(单旋律)欧洲小说模式的突破,从而创造了一个复调世界,“这里恰是众多的地位平等的意识连同它们各自的世

界,结合在某个统一的事件之中,而互相间不发生融合”^{[4](4-5)},这种迥异于传统的“狂欢诗学”由此成为现代小说的诗学品格。从《鼠疫》中33个人物之间复杂的意识表现与应对鼠疫这一共同的精神紧张中,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一个类似于舞台剧的复调世界。无论是塔鲁从原罪角度对鼠疫的思考,还是朗贝尔在情爱与友爱之间的彷徨,无论是隐匿在柯塔鲁内心中的阴暗,还是帕纳鲁一心依赖上帝后的绝望,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审视现代人灵魂的舞台。

同样,如果把对叙事时间的扭曲作为现代小说标志的话,那么,乔伊斯在《尤里西斯》(1922)中的实践显然非常彻底。但是,必须注意到的另一个现代作家就是卡夫卡。早有论者恰当地指出,“卡夫卡无疑是透过‘表现真实细节’并将之纳入一个荒诞非实的框架中去的先驱。在卡夫卡对细节的要求上,有更为抽象的想法——他越是描写细节,便越是显示‘真实’这个概念的不可靠。这个理解在小说史的发展上已属启蒙,‘现代主义’便自此诞生。从此小说家开始掌握另一种对抗时间的方式。”^{[5](150)}这种方式就是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的歧异与错位,具体可以细分成“无话则短”与“有话则长”两种类型。

“无话则短”指故事时间对叙事时间的征服,即作者用三言两语使读者快速掠过或许很漫长的一段日子,营造出一种紧张的氛围。在《鼠疫》的第一部中,“4月16日清晨,贝尔纳·里厄大夫从他的诊所出来,在楼梯平台上被一只死老鼠绊了一下。”^{[1](67)}这句淡然的叙述开始了一个越来越紧张的事件。4月17日,看门人有些不舒服。4月18日,老鼠成批死去。4月29日,看门人发病。4月30日,看门人死去。市民越来越恐慌。5月1日,里厄打电话给里沙尔要求隔离病人^{[1](68-82)}。快速的叙述节奏有效地模拟了事件的紧迫性。但是,随着故事的发展,人们逐渐丧失了对物理时间的掌握,孤立情绪产生,奥兰城也完全成为一座孤岛。这样,在小说第三部,就自然出现了“有话则长”的局面。也就是说,叙事时间实现了对故事时间的征服。时间的停滞使作者的笔触集中到对流放感的细腻刻画,人类的生存处境由此得以酣畅淋漓的表达。

二

从叙事角度展开的上述分析,显然已经凸现了《鼠疫》这部小说的现代意义。但是,值得称道的是,

除了文本的可读性,加缪在叙事中还巧妙地延续了传统的批判精神,实现了隐喻式书写的特有价值,并延续基尔克郭尔的思考尖锐地刻画了“自我”的生存处境。可以说,这是《鼠疫》能成为现代经典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在《致死的疾病》中,基尔克郭尔概括“自我”这一范畴时曾直截了当地宣称,人是由有限与无限、暂时与永恒、自由与必然这些两元因素构成的综合体,是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然而,仅以这种方式来思考,人还不等于一个自我。自我是这种两元关系与自身的关联,因此它是一种关系与自身形成的关系。这种多重的关系结构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任何错位都容易导致“绝望”这种致死的病症。因此,在他看来,只有“那信仰的人拥有那对抗绝望的永恒安全的抗毒剂。”^{[6](295)}基尔克郭尔的这一理论在加缪创作中得以贯彻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不同的是,加缪虽然也强调人的关系状态,但他所说的关系更多地发生在人与世界之间,因此,他用“流放”来缓解极具冲击力的“绝望”。在他看来,流放指代一种生命的姿态,它更多地源于人与世界间认同的匮乏。

的确,流放是加缪一贯的主题,几乎覆盖了他所有的文学创作。如果审视他生前以叙事名义发表的九篇作品(《局外人》《鼠疫》《堕落》和《流亡与独立王国》中的6个短篇)和遗稿《幸福的死亡》与《第一个人》,以及被伽利玛出版社归到“随笔”名下但严格地讲仍然具有叙事性质的文本(《反与正》中的前三篇),可以发现这总数为14篇的叙事作品中贯穿了一个基本内容:人生在世的孤单。有人据此认为,“孤独”是加缪的潜意识表现,是比形而上的“荒诞”与“反抗”更为根本的题材⁷⁽¹¹²⁻¹²¹⁾。这自然是更有道理的。不过,在笔者看来,作为对切身的生命体验的把握,依旧用与“孤独”相类似的“流放”来概括会更有力度。

实际上,现代派作品中许多篇目都曾经展示现代人的流放感和孤独性,如奥尼尔的《毛猿》,卡夫卡的《变形记》《城堡》《审判》,萨特的《恶心》《禁闭》《苍蝇》以及荒诞派戏剧等等。这也暗示出在现代人所共同拥有的心灵处境中,个体生存与所处环境之间已经产生了无可挽回的断层,个体对外部世界的不安显得如此普遍。在这些荒诞星云中,加缪叙事作品的特殊性体现为:由于人与世界的错位,存在着方向相异的两种流放——自我放逐与被迫流亡。所谓自我放逐,指现代人对荒诞世界刻意的反抗,比如自得其乐的默尔索(《局外人》);所谓被迫流亡,则指无

意间陷入极限处境中的挣扎着的现代人,比如《鼠疫》中的主人公。可以说,这两种流放正是“荒诞的人”在世的基本姿态。如果说后者是恶的象征,暗示了加缪对暴力的谴责,从而距离优美与崇高都格外遥远的话,那么,前者在诉诸个体情怀时,则带有些许温馨的审美意味。比如,在《流亡与独立王国》(1957)中,加缪描写了一个叫雅尼纳的“不忠的女人”对远方的饥渴心理:

在远方,更往南行的地方,在天与地连成纯净的直线之处,她突然觉得有什么东西在期待着她,那是她迄今不曾注意却正是所需要的东西。在这近乎黄昏的午后时分,阳光逐渐变得极其柔和,它由水晶色泽变成了流质。与此同时,在一名偶尔来此的女人心头,一个多年来由于积习和烦闷而形成的情结,正在缓缓解开。……雅尼纳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念头搅得她心中充满无涯而甜蜜的惆怅,以致她得紧闭两眼才能尽兴。她只知道:她一向是得以期盼这奇特王国的,但它将永远不会属于她,不再可能属于她,除非是在此时此刻,这稍纵即逝的瞬间^{[8](306-307)}。

这一段抒情的文字极其细腻地刻画了一个“生活在别处”的女人的心理。这里之所以说它细腻而真实,是因为,它书写的,甚至就是你我曾经或即将面对的生活。谋划一次离家出走,一次18岁的出门远行,是每一个寂寞少年抑制不住的性情事件,它展示出初萌的青春热情与对未来的缥缈向往。然而,随着年岁的渐长,生活的锉刀常常将这些少年狂想一寸寸磨平。于是,对远方的想象也就真的仅仅成为一种想象。正如这位“不忠的女人”,婚姻的琐屑湮没了少女时代瑰丽的梦幻,平庸的生活也终于成为每日每时都得啜饮的食粮。从此,在夜深人静处自我放逐,只能成为她最奢侈的精神享受。

但是,在加缪的笔下,还有一种更严峻更残酷的生活状态,在这里,甚至连梦想的影子都无处存身,它远远越过了作为“自我放逐”的心理事件,而直逼现代人的精神重心。《鼠疫》中对苦难,尤其是对无辜孩子之死的书写正属于此,可以说,这种被迫放逐是人类无可回避的灾难。

三

现代人背负和体验着双重痛苦:一是肉体与精神所承受的困厄、孤独、疾病、死亡等;二是对生活合理性的质疑和抗议而加增的更为强烈的痛苦。由于

后者是有自我意识的人对生存世界和个体行为的冷峻审视与尖锐思考的结果,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后者比前者更为惨烈而难以承载。在《鼠疫》中,加缪所着力展开的就是对苦难的思考。小说借助以里厄医生为代表的几位人物形象,思考了面对苦难时人的态度问题。“人人身上都潜伏着鼠疫,因为,没有人,是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免受其害。”^{[1](210)}这句出自塔鲁之口的双关语,无疑饱含着意味深长的指涉。它提醒我们,没有什么与自己无关,在威胁人类的灾难被消除之前,不存在所谓个人的幸福。正如英国诗人邓恩所说,“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损失,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丧钟是为你而鸣的”。通过对一场瘟疫的具体描绘,小说将我们常常以为牢不可破的依靠摧枯拉朽般地打垮在地,强迫人们走出往日的隐蔽,勇敢地面对现实和未来,重新寻找生存的依据:应该而且必须抵抗恶,这就是我们的命运。

因此,《鼠疫》中的“鼠疫”已不仅是一种具体的传染病,而成为多层面的象征。大体而言,分离、没有女性和死亡这三种象征性生活境况隐喻了苦难的无处不在。首先是分离的境况。鼠疫的肆虐使奥兰城成为一座孤岛。于是,亲属的分离、夫妻的分离、情人的分离等等成为普遍的现状,它们意味着隔离、封闭、囚禁、流亡和集中营。可以说小说中对种种生离死别的描写是着力而动人的,构成了感人的人道主义篇章。其次是小说中没有任何一个女性的境况。没有女性意味着失衡、畸形、苦涩,没有生机,没有激情,没有希望,没有未来。这种干涩的生命状态暗示了恶的肆虐与对美的放逐。这二者共同营造了一个远离鲜花与欢笑的黑暗之城。第三种象征性生活境况是死亡,它意味着极度的痛苦,完全的黑暗和彻底的毁灭。显然,在这三种境况中,死亡,尤其是无辜孩子之死,是人之荒诞处境的核心,是一切苦难中最令人无法释怀的恶,在《鼠疫》的第四部,加缪的描写让读者心悸不已:

当灼人的热浪第三次袭击他时,他略微抬了抬身,随即蜷缩成一团,同时,出于对火焰般烤人的高烧的恐惧,他退缩到病床的尽头,发狂似地摇晃着脑袋,掀掉身上的军毯。大滴大滴的眼泪从他红肿的眼皮下涌出,顺着他那铅灰色的小脸流淌起来。发作一阵之后,他精疲力竭,蜷缩着他那骨瘦如柴的双腿和胳膊,经过四十八小时的折磨,孩子身上的肉已经消失殆尽了。这时,在这张惨遭蹂躏的床上,病孩儿的姿势让人想到奇异的钉在十字架上的基

督^{[1](186)}。

这是法官奥东先生的幼子垂死前的挣扎,加缪以近似笔录一样的方式让这些瞬间得以存留,残忍而真实。笔者相信,没有任何人会对这个场景无动于衷。孩子,像百合花的蓓蕾一样缓缓开放的生命,曾经给每一对祈祷的父母带来无尽温暖的希望,就在这里,在我们的眼前,一点一滴地凋零。伸出去遮掩的手,擦拭掉无声的泪,都无法阻挡住哪怕是片时片刻。幸福,早已是如此遥远;生命的脆弱,却又是如此真实。当孤苦无告的眼睛抬起,谁又能不质问:上帝何为?!

是啊,在哀鸿遍野的人间,上帝何为?在追问这个问题时,加缪显然延续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考。陀思妥耶夫斯基终其一生思考苦难、写作苦难,要靠作品完成对苦难的征服。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无神论者伊凡虚构了宗教大法官的传说。伊凡崇尚理性,不承认上帝,不接受上帝给予的世界,正是因为他不能容忍苦难,特别是无辜孩子的眼泪。他抗议道,“假如大家都应该受苦,以使用痛苦去换取和谐,那么小孩子跟这些有什么相干呢?……我完全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用痛苦去换取和谐呢?”他对上帝大声喊道,如果天国必须要一个捶着胸口而悲伤的无辜孩子的眼泪,那么他宁可退掉天国的入场券。可以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不局限于呈现此世苦难,而是努力走出堕落的低谷,要“为克服堕落而忏悔”。因此,他抗拒理性的僭妄,但绝不彻底放逐理性,“因为没有理性人类将无家可归”^{[9](359)};他描述“地下室人”的痛苦,但绝不放弃灵魂的自由,而要选择苦难之后的自由。“地下室人从他生活的环境中产生了反抗强加给他的限制的正确尺度;但是,抉择的经验令他去寻找‘全然不一样的东西’,首先去选择真正的自由。”^{[10](88)}这“另外的东西”就是基督。也就是说,重新寻找基督的道路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为现代痛苦所指引的解脱之途。

可以看出,关于苦难主题,加缪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参照非常明显。但正是在这里,我们区分出了两位思想家的高下。对于威胁人类的灾难是什么及来自何方这个关键性问题,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很矛盾,但是,在晚年几乎所有的长篇小说中,他倾注了无可穷尽的天才去思考,并对“群魔”的历史面相进行了不懈的探究,显示出大无畏的思想勇气。然而,“加缪却回避对鼠疫面相的研究,他愿默然承认:人的认识是有限度的;人不可能得知恶的根本原因。因此,在他的小说中,瘟疫本身没有得到研究:

它来了又走了,既没有除去假面也没有向人们露出自己的真相。”^{[11](298)}这是加缪无可讳言的局限,也是他在思想深度上不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原因。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加缪通过以里厄医生为代表的创造者传达了另一种希望,一种不是来自圣灵,而是来自你我内心的希望来抗拒历史的疯狂和虚无,这依然有其积极的意义。因为,相对于扑朔迷离的“鼠疫”,这种人性的力量更加真实与具体。因此,在小说《鼠疫》中,虽然加缪没有探究清楚“恶”的本相,但他树立了一种克服精神危机、重新确立生存哲学、在艰难岁月中如何生活的信仰。这种在“人”身上体现出来的希望与信仰虽不如橡树一般高大英俊,却更像是加缪用诗一般的语言所赞美过的海边的扁桃树:

我住在阿尔及尔时,冬天我总是耐心地等待着,因为我知道,只需一夜的时光,仅仅一个夜晚,寒冷而纯净的夜晚,康苏尔山谷的扁桃树就会开满白花。随后,我便看到这层脆薄的雪即可抵挡每一场雨以及海上的风,这使我赞叹不已。然而,年复一年,它都在坚持,准备着果实^{[12](209)}。

或许,这一象征就是加缪提示给我们的极限处境中的选择。或许,还会有无辜的孩子在挣扎中死去,还会有莫名的灾难在某处降临,但是,正如诗人里尔克所说,“有何胜利可言? / 挺住, / 意味着一切”,加缪在《鼠疫》中给出的答案也正在于此。

总之,在现代叙事模式的基础上,《鼠疫》思考了人的苦难、死亡与存在,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推到了极致,在感同身受之中把握生命的荒诞感;同时,在故事的隐喻层面,作家又毫不含糊地将“荒诞”定位于世界的起点上,指出“反抗”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力量之源,是生命之贫瘠与丰富的联结点。因此,正

是在荒诞与反抗之间,现代人才真切地体会出极限处境下的抉择,才能在真实性与可能性中活出自我的风采。或许,这就是加缪及其《鼠疫》的现代意义。

致谢:

本文从立意到写作均得到导师浙江大学徐岱教授的悉心指导,谨致谢忱,并借以怀念我在杭州的日子。

参考文献:

- [1] 加缪. 鼠疫[M]. 加缪全集:第1卷.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 [2] 加缪. 西西弗神话[M]. 加缪全集:第3卷.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 [3] 张容. 形而上的反抗:加缪思想研究[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 [4] 巴赫金.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 白春仁等,译. 巴赫金全集:第五卷.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 [5] 张大春. 小说稗类[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 [6] 基尔克郭尔. 概念恐惧·致死的病症[M]. 京不特,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
- [7] 黄轶耘. 加缪叙事的另一种阅读[J]. 外国文学评论,2002,(2):112-121.
- [8] 加缪. 流亡与独立王国[M]. 于世中,译. 加缪全集:第1卷.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 [9] 徐岱. 批评美学:艺术诠释的逻辑与范式[M].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
- [10] 叶夫多基莫夫. 俄罗斯思想中的基督[M]. 杨德友,译.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 [11] 格·弗里德连杰尔.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世界文学[M]. 李春林,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 [12] 加缪. 夏[M]. 王殿中,译. 加缪全集:第4卷.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Between absurdity and rebellion —— Interpreting *The Plague*

WANG Hongchen

(Institut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Drama and Immaterial Heritage,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inking about suffering, death and being, Albert Camus' novel *The Plague* took the hard circumstances of the modern man to the extreme. It built the tension between absurdity and rebellion, and confirmed a kind of action in one's power. The novel provided the modern man with love in seeking faith at the terrible time. So, how to locate oneself between absurdity and rebellion becomes the important aspect for the modern man's thinking.

Key words: Albert Camus; *The Plague*; absurdity; rebellion

[编辑:苏慧]